

书林撷英

世界是这样知道长征的

□丁晓平

红军长征是20世纪影响世界的重要事件,是充满理想和献身精神、用意志和勇气谱写的人类史诗。世界最初是如何知道长征的?要回答这一问题,就要回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围绕长征的创作、编辑、出版和传播故事,而它们,早已成为长征历史的一部分。

一幕幕亲历见闻在他心中激荡

说到最早向世界宣传红军长征的人,就不能不提到陈云同志。长征出发前夕,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被委任为红五军团的中央代表。红五军团承担着艰苦的殿后任务,战斗的残酷激烈程度比前卫部队有过之而无不及。1935年6月,陈云革命中途离开长征。原因是,遵义会议后不久,中共中央获悉,上海中央局被敌破坏,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陈云被派去上海恢复白区的党组织,设法寻找同共产国际的联系。几经周折,他终于接上组织关系。不久,又接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让其赶往莫斯科。

从7月初到8月初,在上海的陈云暂时远离了枪林弹雨,但血战湘江的惨烈、翻越群山的艰辛、四渡赤水的运筹,一幕幕亲历见闻在他心中激荡。于是,他拿起笔,以“廉臣”的笔名,假托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的口吻,详细记述红军部队从江西出发,历经千难万险的西行历程。书稿最后在莫斯科修改完成。这篇题为《随军西行见闻录》的珍贵文献约3万字,于1936年3月以连载形式发表于法国巴黎出版的中文杂志《全民月刊》。同年7月,单行本在莫斯科出版,成为首部描写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著作。

《随军西行见闻录》所写的长征自然是不完整的,而长征队伍中,向来不乏接续书写的记录者。红一军团的《战士》报是长征路上连续出版的一份报纸。1935年12月30日,在新年即将来临的时刻,这张报纸以两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撰写的文章《艰苦的一年,伟大的一年》,回顾这一年“我们以一双脚一支枪,百战不死的身完成了人类空前伟大艰苦神圣的远征!”

1936年10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省会宁胜利会师。仅仅两个月后,远在巴黎的《救国时报》就开始以连载的形式发表署名“杨定华”的两部作品《雪山草地行军记》和《由甘肃到山西》,接续讲述红军长征北上而后东征山西的过程。而“杨定华”的身份,直到70年后才被揭开,他就是长征的亲历者也是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邓发同志。

1937年,《随军西行见闻录》和《雪山草地行军记》《由甘肃到山西》合刊为《长征记》一书。这部合著的《长征记》应是完整翔实叙述长征历史的第一部图书,但遗憾的是,目前发现的只有该书俄文版,中文版尚未找到。

写上一段即是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

中央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后,面对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如何驳斥国内外媒体上歪曲、污蔑、攻击共产党和红军的谣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开始酝酿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征集个人日记,做好对外宣传工作,把红军和苏区的真相告诉全国人民和全世界。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到访,无疑加速了这一进程。

1936年8月,毛泽东和杨尚昆给参加过长征的将士发去征稿信:“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次开展集体性的历史写作活动。

不到3个月时间,征文活动就收到200多篇来稿。“写稿者有三分之一是素来从事文化工作的,其余是‘桓桓武夫’和从红角中,墙报上学会写字作文的战士”。作家丁玲生动记述了编辑《长征记》时的情景:“一些用蜡光油纸写的,用粗纸写的,红红绿绿的稿子,坐在驴背上,游览塞北风光,饱尝尘土,翻过无数大沟,皱了的纸,模糊了的字,都伸开四肢,躺到了编辑者的桌上……于是编辑们,失去了睡眠,



日夜整理着,誊清这些出乎意料,写得美好的文章。”

伴随着征文活动的展开和《长征记》的编辑出版工作,“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万里长征”等说法广泛流传开来。

文稿经过编辑后,因红军东征,没有马上付印,直到1942年11月,才在延安以《红军长征记》为名,作为党内参考资料铅印成书。书后还附有10首红军歌曲和4个统计表格,分别是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经过名山著水关隘封锁线表、经过的民族区域情况和长征所处环境一览表,是研究长征历史极为珍贵的原始文献。

上世纪50年代,《红军长征记》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先后以内部资料连载和公开出版的方式与读者见面。后来我们熟知的一些长征故事、长征书籍,很多都是以这本书为基础的。

是新闻报告,更是活历史

向世界报道长征的作品中,无疑有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这部书1937年10月出版英文版,1938年2月译作《西行漫记》的中文版在上海面世。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在《红星照耀中国》出版之前,斯诺撰写的《长征》篇章就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于美国《亚细亚》月刊,中文版则由汪衡翻译为《两万五千里长征》,在《文摘战时旬刊》连载,并于1938年1月出版单行本。

《长征》是斯诺1936年10月在陕北保安采访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高级将领后写作的,后来成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第五章。中国问题专家诺曼·威尔金森评价他“只用了25页的篇幅,便至为感人地描写

了这一史诗般壮丽事件”。斯诺这样写道:“不论你对红军有什么看法,对他们的政治立场有什么看法(在这方面有很多辩论的余地),但是不能不承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

同样被红军吸引的,还有一位著名的中国记者,他就是范长江。

内忧外患,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到底什么样?他们在西南和西北的情况究竟如何?1935年5月,揣着这些问题,26岁的范长江从北平赶到天津,找到当时的《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开门见山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我要去考察西北,了解红军。”

接下来,就有了他历时10个月、长达3000公里的采访之行。在1935年至1937年间,范长江撰写了数十篇反映红军长征的新闻通讯,结集为《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引起强烈反响。《中国的西北角》出版后,未及一月,数千部就已售罄,短时间内印刷9次,发行10多万册。胡政之评价范长江这一系列作品:“虽是新闻报告性质,实际就是中华民国的几页活历史。”

长征的叙述传播史,其实是与长征同步发生发展的。这一次次书写,讲述了长征的原因、经过和意义,展示了红军将士的风貌,也传播了伟大长征精神。它们不仅吸引和感召着中国的革命者与爱国青年,也影响和改变了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印度医生柯棣华,记者史沫特莱、爱泼斯坦等一大批西方人士,由此踏上前往延安和抗日前线的道路。这些记录长征历史的作品跨越时空,帮助更多人读懂长征,读懂中国,也激励今天的我们继续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摘自《人民日报》)

文化漫谈

书影联动,别让阅读止于一时热度

□李卓尔

据报道,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火爆出圈后,带动《平安批》《海天片羽:潮汕侨批史话》等侨批主题图书热销。电影《奥德赛》全球热映,同样带动《荷马史诗》销量一路暴涨,英国市场相关诗歌收入增长近百万英镑。纵观文娛市场,影视带动原著及相关图书热销早已不是个例,光影热潮持续唤醒大众的阅读热情。

近年来,各种统计数据表明,当下人们平均用于“观看”的时间远远超过用于“阅读”的时间。书影联动在培养提升全民阅读意识方面,无疑有着积极意义。

影视直观生动、感染力强、受众广泛,能快速引爆话题、掀起热潮,有助于打破阅读的门槛,把普通观众引向书本。许多人面对喜爱的作品,养成了“看完影片读原著,追完剧集品文字”的习惯。与其止步于影视改编的精简剧情、镜头演绎,不如翻开原著,解锁完整的故事脉络、细腻的情感细节与深层的文化内涵。古人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书本阅读,便是读者与作者的直接对话,是不受局限、沉浸式的自我体悟,是一场自主探索、细细品读的精神修行。

当碎片化信息充斥生活,深度阅读逐渐成为稀缺品。许多经典典籍、小众文化读物,因门槛较高、认知度低,常年被束之高阁,难以走进普通大众。影视剧《太平年》热播后,某读书平台上《五代十国全史》(全八册)迅速冲上热搜榜。这段历史厚重复杂、史料枯燥,若非影片演绎,很难被大众熟知。影视以光影为桥,将晦涩文字转化为生动画面,将冷门经典转化为热门话题,降低了大众接触经典、品读文本的门槛,让更多人从被动听闻变为主动研读,为全民阅读拓宽了受众边界。一场影视热潮,不仅能带动

往事随风

全凭这双大脚

□彭克昌/口述 姚景强/整理

我有一双大脚。很多次,我向别人讲述参加红军、参加长征的事,总要从自己这双大脚说起。

1913年7月,我出生在四川省通江县一个普通农民家里,1岁多时丧母。后来,父亲又给我娶了个后娘。当时的旧社会,女人兴裹脚。后娘嫌弃我,不给我裹脚。我自己裹了几次,那长长的裹脚布怎么也缠不好,就干脆不再裹了。于是,我长了一双大脚。

1932年11月,红四方面军进入陕南川北地区。红军在到达通江县的第三天,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扩红宣传。听宣传员说,红军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我不堪忍受后娘的虐待,也想当兵。我在招募站徘徊了好一会儿,终于鼓起勇气问道:“女娃能当红军吗?”一位红军首长问我:“当红军很苦哩,你这个川妹子,能行吗?”我不服气地说:“我们乡下妹子苦惯了,怕什么!你看我这双大脚,和男娃赛跑,准超他们前面。”

就这样,我参加了红军,走上了革命道路。

我跟随部队转战川、陕、甘的4年里,每天除了行军,就是打仗。那时,我全凭这双大脚。

1935年初夏的一天,我所在的红四方面军战地医院三分院遭到地方土匪武装的袭击,必须立即组织伤员进行突围。

那天刚下过雨,组织伤病员转移十分困难。突围过程中,警卫排的战士们和轻伤员先为担架

单本图书的销量暴涨,更能激活一类经典、一种文化、一段历史的传播生命力。

但影视带来的热度,有时只是阅读的诱因。许多优质影视都需要依托经典文本筑牢内核、打动人心,需要厚重的文字基础承载文化底蕴、传递人文温度。电视剧《繁花》热播后,不少观众看完剧集,选择回到书中体会文字独有的韵味。这场书影双向赋能的成功,很大原因在于镜头虽做艺术取舍,但保留了原著的时代质感与精神内核。如果只有影视流量,原著内容空洞单薄,观众被剧情勾起的好奇心,翻开书本便会落空,短暂热潮过后,阅读的热情便快速消散。

书影联动本是培育大众阅读习惯的良好契机,可市场上也存在一些现象:部分作品依靠影视营销造势,推出所谓“纪念版”“限量版”,但原著文本质量平平,热度褪去之后图书迅速归于沉寂。热闹的销量数据不等于真正的阅读普及,买书不等于读书,一时跟风不等于长久的文化浸润。

纵观历次影视与文学联动热潮,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四大名著被搬上荧屏,到《骆驼祥子》《白鹿原》等成为几代人的影视记忆,再到如今《人世间》《我的阿勒泰》等受到广泛关注……许多能够长久流传的影视作品,都是扎根于深厚的文学土壤;而那些经久不衰的经典文本,也依然能借助新的传播方式焕发新生。

书影联动能不能真正带动全民阅读,从来不靠一时声势,而要看看内容本身是否经得住时间打磨。当更多人愿意跳出镜头、翻开书页,静下心来体会书本里的情感与思考,如此,文字与光影方能双向赋能,书影联动才不会只是转瞬即逝的市场风潮,而慢慢沉淀为长久的文化生态。

(摘自《人民日报》)

队杀开一条血路,一边撤退,一边阻击,掩护医院转移。在紧急关头,我凭着个大、脚大、力气大,肩上扛着一副担架,背上还背着一个伤员,一口气跑了三里路,才被别的同志救下来。

长征中最困难的阶段,是横跨茫茫草地。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决定北上,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8月,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当时,我由红四方面军调入红一方面军,编在右路军。8月下旬,右路军率先出发,进入草地。没过多久,我们突然接到命令:掉头南下,再过草地。这样,一去一来,我和我的战友们两过草地。

1936年7月初,红四方面军主力与红二、红六军团在甘孜会师后,部队重新掉头北上,穿越草地,向陕北进发。第三次过草地时,由于遭到敌人的袭击,供我们食用的牦牛被抢,部队遇到了极其严重的粮荒。为了生存,我和战友们想尽了各种办法,先是节约粮食,互相调剂;后来粮食吃光了,就把牛皮、牛羊骨髓煮充饥;野菜挖光了,就想办法到河沟里钓鱼。在40多天的草地行军中,我的许多战友长眠在了草地。我在过草地之前,脚上受了伤。起初,我担心在污水和腐草中行走,脚会烂掉,过不了草地。但最终凭着毅力和这双大脚,我跨过了草地,跟随部队走完了长征。

(摘自《解放军报》)



科学新知

□张家伟

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一个开源人工智能平台,可在肿瘤样本中快速、精准分析数十万个细胞,绘制肿瘤内细胞中心体异常的空间分布图。研究表明,中心体异常的空间分布与癌症临床特征相关。新成果未来有望用于癌症患者风险评估、开发新的靶向疗法等。南安普敦大学日前发布新闻公报说,中心体是细胞的“组织中枢”,

人工智能揭示癌症隐藏特征

能帮助细胞正常分裂并维持其结构。中心体出现异常时,细胞可能积累遗传错误,这是癌症特征之一。

该校研究人员领衔的团队,利用团队开发的名为CenSegNet的人工智能平台,对来自127名乳腺癌患者的911份肿瘤样本中超过33万个中心体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中心体异常类型:一类是细胞内中心体数量过多,另一类是中心体异常增大。两种异常形式相互独立,可出现在同一肿瘤

的不同区域。

研究还显示,异常增大的中心体较多的肿瘤与更具侵袭性的疾病特征相关,包括较高的肿瘤分级、淋巴结受累和某些遗传改变等;而肿瘤核心区域内增大的中心体数量较少的患者,其总体生存情况往往更好。

相关论文发表于英国《自然—通讯》杂志。论文通讯作者之一、南安普敦大学研究人员萨拉赫·伊莱亚斯说,研究显示,中心体异常具有不同的生物学状态,呈现不同的